

筚路蓝缕

计划经济在中国

程连升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筚路蓝缕

计划经济在中国

程连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程连升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098-3768-9

I. ①筚… II. ①程… III. ①中国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研究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3283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鹏

复 审：吴 江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420 千字

印 张：32

印 数：1—6000 册

版 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3768-9

定 价：56.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序 言

20世纪是中国全面回应世界现代化潮流挑战的世纪。在中华民族外侮频至、内乱不息的生存状态下，启动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建立集中统一的、现代化导向的中央政权，确定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范式，以国家政权的权威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事业。由此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寻路”的历史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的现代化将由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指导，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组织推动，进入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路径。然而，社会主义范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什么？当时还缺乏基本的经验和准确的认知。于是，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寻寻觅觅，不断积累和丰富着经验。期间，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之后，由计划经济转向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经济，最终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上述两次转型之间，甚至第二次转型的前期，是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资源发挥配置作用的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中国在经济效率上和国民物质福利上付出了极为高昂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却建立了非常强大的国家意识，能在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凝聚社会的意志力于最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建设目标上。在此过程中，国家发挥最大的动员力及执行力，将全国重要的土地资源及

工业资产全部转为国有化或集体化，构成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目标的最庞大的政治及社会资本。这种社会主义所构成的历史发展条件，当然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与复制的。应该说，近4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伴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计划经济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如何看待计划经济的历史及其遗产，也就提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前。尽管官方最初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建设业绩给予肯定性评价，但不幸的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迅速蔓延，再加上人们对“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物质主义成为评判复杂历史问题的唯一尺度，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历史及其业绩的观点成为学界主流。一时之间，对计划经济的批判铺天盖地：有人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20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结果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也有人说建立计划经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误区，是导致中国长期陷入贫困落后的根源。更为奇怪的是，即便在改革开放持续3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中国经济社会出现新矛盾时，不少人还一股脑地把病根归结为“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说到底还是计划体制机制问题”，无形中把改革中的失误不足均归咎到祖先头上。这样，计划经济逐渐成为一个“大垃圾筐”，什么罪责都可以往里面装。

对计划经济历史的妖魔化解读，当然有很多复杂原因。但依笔者看，首要原因是社会历史评价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即历史科学仅仅被视为政府政策推行的一个工具，而非国家治理经验的积累。在各种公开场合，丑化和否定计划经济的言论不计其数。其认识论根源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历了长期激烈的思想政治文化斗争，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就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否则似乎就没有合法性。其理论误导就是把计划经济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殊不知，这两个错误主要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一些特殊想法，实际上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无关，也不代表计划经济运行全貌。也有一些借改革开放之机攫取巨大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将毛泽东时代和计划经济时期描述为历史最黑暗的时期，把改革开放以后定义为历史最好时期，以致忽视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新生问题的反思和校正。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经济学化”。自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后，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皇冠明珠”。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从方法论到基本概念，基本上都被经济学化了。经济学家对社会和历史分析的标准，成为社会科学趋之若鹜的标准；经济学家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简单认知，经常成为评价复杂社会历史问题的结论。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根本没有意识到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认识问题缺乏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只遵从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概念和标准，从而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评价标准被简单化了。影响所及，对前30年中国现代化建设即计划经济时代历史的解读，就只念新自由主义的经，只认“功效理性”或“效率理性”的标准。物质主义价值标准和新自由主义相互激荡，使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史被严重歪曲，计划经济时期被视为不堪回首。

毫不讳言，过去30多年历史分析的方法论标准，以及对以往历史的片面解读，虽然一度迎合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范式转型的需要，却因违背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真实和社会体验，导致整个中国社会的不断撕裂，造成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知上的断裂。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深层次社会矛盾时，整个社会却迟迟难以达成深化改革的“共识”。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命题，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前一个“不能否定”，要求我们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坚守住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成果和成就。

可见，弄清计划经济在中国建立演变的历史，还原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业绩，不仅是一个历史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焦点问题。这也许就是触发笔者撰写本书的动因。

二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计划经济在中国的成立与变革过程，时间范围从1949年到2000年，计50余年。为了能够扩充认识视野，书中也涉及计划经济思想的起源和外国实践，以此把中国计划经济史放到世界历史剧幕中去把握。全书主体内容分为十章，另前设一个引子，后缀一个结语。

引子是对计划经济思想源流和外国实践的考察。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给我们送来了计划经济的思想。要弄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期钟情于计划经济思想，就必须搞清楚计划经济思想的形成、内容和发展，以及计划经济在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表现。只有搞清了这些问题，才能了解计划经济在特定时期的卓越成绩和非凡魅力，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的时代背景，说明当时中国的选择并非异类，而是与国际上主流经济思潮基本吻合的。

第一章梳理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20世纪30年代后，受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和九一八事变的刺激，中国出现了发展计划经济的强大思潮。此后十多年里，国民政府也为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做了大量努力，但最终失败了。计划经济在中国的真正建立发生在1949年到1956年间，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1953年到1956年全面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第二章考察了经济计划的制订与执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通过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整体的直接管理。通过考察中国计划经济建立初期的运行机制与特征，发现中国计划经济建立伊始，虽然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但其中也不乏自己的国情特点和部分变通意识。这些特点既适应了当时工业化建设资源集中、统一调配的需要，又回应了中国的国力国情，使计划经济体制具有适当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第三章阐述了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行的初期作用和效果。通过对工业化资

金筹措和经济发展绩效的考察，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对冲破低水平“贫困陷阱”、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工业化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计划体制也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但是，这种体制的不断日益强化，也在某些方面显露出限制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弊端，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从而启发了中共高层对其进行变革完善的思考。

第四章分析“大跃进”时期中国计划经济的变革。从1958年起，在“超英赶美”口号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激进化，否定了稳步前进、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解体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高层班子，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期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指导思想上变成了主观主义的命令经济，运行机制上形成了地方分权和各自为政，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严重混乱和巨大损失。

第五章考察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计划经济。从1961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不仅着眼于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同时也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大跃进”期间下放的大量经济管理权上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重新得以修复，经济的统一性和科学性有所增强，帮助中国经济度过困难并步入正常运行轨道。但在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后，理性计划派再度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预示着中国计划经济又将遇到一次大的变化。

第六章讲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计划经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他难以容忍中央计划经济所导致的“官僚主义”和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文革”爆发后，中国经济综合管理系统被政治斗争冲击得七零八落，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管理制度被“理论大批判”攻得一无是处，中国的计划经济演变成为“运动经济”和“战备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遭受巨大破坏后，无政府主义盛行，国民经济秩序重新陷入全面混乱状态。

第七章概括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1949—1976年（或延至1978年），通常被称为“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奠定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础，经济建设具有明显的奠基性、备战性和公共

性，但产业结构不平衡，经济发展不稳定，居民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日益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运行阻力。虽说这一时期仍被人们称为计划经济时期，但在多次运动的冲击下，经济体制逐渐走了样。当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留下来的体制遗产并非真正的计划经济，而是一种混乱的命令经济。

第八章考察1978年到1984年的中国计划经济。在这个阶段上，中国工作重心已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了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中央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改革思路，虽未从总体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但已深感不能排斥市场经济的作用。于是，在计划经济的肌体中，开始接纳了市场调节的新成分，通过放权让利使企业和农村基层组织有了部分自主权，允许非公经济的渐进成长，中国经济出现了混合经济的特征。

第九章考察1985年到1991年的中国计划经济。这一时期，市场调节的作用逐渐突破了“为辅”的框框，认识上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基本并列，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日趋明显，中国经济于是进入了“双轨制”状态。尽管在这个阶段的后几年，社会上出现了“以计划为主”还是“以市场为主”的激烈争论，但事实上计划经济管理已经被冲击得体弱无力，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以市场为主、计划为辅”的格局。

第十章讲述1992年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度转型。党的十四大后到2000年，中国经济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要求，全面放弃计划经济，并通过执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方针，企业、价格、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工作急速推进，快速增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世纪末，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计划经济在中国已然成为历史。然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还很艰巨，其中不能完全排斥计划管理的辅佐。

结语对全书的中心思想和研究心得进行概括，并对撰写的宗旨给予呼应。通过系统回顾中国计划经济建立和发展的道路，我们明确意识到：计划经济建立是历史的选择；计划经济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重要作用；任何经济体制

都存时空关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属必然；尽管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经济运行仍然离不开国家计划的调控。

三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但对这种新体制进一步完善的方向性思考，依然离不开对计划经济历史的认识。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主观建构出来的，而是从计划经济这个既定的前提出发，结合国情不断改革形成的。所以，忽视对计划经济的深入研究，不分清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建设的主流和支流，不全面认识计划经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意义，中国道路探索中的许多问题也就得不到透彻的理解。这样看来，研究计划经济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而且是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思考联系在一起的现实问题。

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习近平讲话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前后两个时期，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大业中。

依笔者的体会，各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道路，由于各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大转折时代面临的历史环境相异，选择何种经济制度都会有自己的“路径依赖”和约束条件。经济体制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时空问题。优秀经济学家的基本功，在于对历史资料的掌握，正如美国学者E.雷·坎特伯里在其所著的《经济学简史》中所强调的：“历史是研究思想的基础，……在经济学家，历史从来都不应被忽略”。也就是说，历史主义应是经济学者论说的语境基础和出发点，伟大的思想成就都是从自己祖国的历史和关怀出发去观察世界经济或世界经济史而形成的。

因此，如果有人问我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选择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

坏这个问题时，我只能这样说：在那样的历史时刻，这种选择是必须的，也可以说是最好的。因为当时中国最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一是国家的国防安全。这两样需求既是百年来民族命运不幸遭遇提出的呼唤，亦是冷战格局下新生大国政权稳定和发展的重器。为了尽快得到它们，就得在发展战略上做出重工业优先发展，就得借助政府的强大组织和动员能力，做出计划管理的制度安排。所以，归根到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一种政治配置，这种配置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支撑下与强制工业化和集权政治相适应的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

在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下，首先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计划经济建立后所表现出来的粗放型特点，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用于工业建设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那么多年的主要原因。当然，计划经济体制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再加上毛泽东特殊的理想主义与实践，“左”倾错误频发，导致计划经济积累太高，国强民穷，国家对老百姓的消费有巨大历史欠账，等等。这种一体两面的特点，也是我们今天对计划经济历史作用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

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也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在转变社会发展路线以及由此引起的意识形态、产权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基础上，解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结果，并不是对计划经济的简单抛弃。经济转轨是把在计划经济下积累的财富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转换成现实的GDP，因此转轨或者说改革，是综合体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方面贡献，绝非市场经济一方。历史是螺旋型发展的，发展方式具有时代的烙印。随着社会基础业已出现的变化，伴随世界主流经济思潮的转换，计划经济只能成为历史，但由此就把计划经济的积累贡献和制度价值完全否定，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因为对中国而言，那是一段筚路蓝缕的辉煌历史，一段全体人民付出巨大牺牲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纵览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进程，先后历经工业化赶超—四个现代化—全面发展三个阶段的相继嬗递，而60多年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关键，便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因时因地的调整。如果说改革前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计划经济创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一个初步现代化的国民经济大框架，增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势能”，那么，改革后则是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变“势能”为“动能”并提升现代化的层次和水准。在此过程中，中国现代化主题认识的转换，是对“不挨打—不挨饿—不挨骂”历史需求转换的回应。因此，如果我们以历史主义视野来观照，就不难看到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中，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是筚路蓝缕、艰难困苦的，但发挥了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历史作用。

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曾为“当代中国研究”开启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即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结合历史经验与实际进程，免于纯数学推演所极易导致的脱离实况式“黑板经济学”之尴尬境地。他在集其晚年学术精义之大成的《变革中国》一书中，对中国道路毫不吝啬溢美之词。一方面，他指出“中式市场经济的崛起为其他文化与历史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国家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榜样”；另一方面，他也坦承如不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一整体把握，也就无法理解此后改革年代的经济巨变。他说，改革是对毛泽东未竟之业的再延续。诚哉斯言！

目 录

引子：计划经济思想起源和早期实践 / 1

第一章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 25

 第一节 民国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情愫 / 25

 一、计划经济思潮在中国的勃兴 / 26

 二、国民政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 / 30

 三、计划经济资源的延续与继承 / 33

 第二节 中国计划经济的萌生 / 38

 一、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 / 38

 二、计划成为经济管理的一种方法 / 42

 三、建立统一领导全国经济的管理机构 / 44

 四、部分行业开始走向集中管理 / 47

 第三节 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 / 50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51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完成 / 53

 三、计划管理体制的全面形成 / 56

 第四节 中国建立计划经济的基本缘由 / 64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确立 / 65

 二、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因和影响 / 69

 三、新中国成立初的市场环境与工业化建设的矛盾 / 76

 四、中国建立计划经济的可行条件 / 84

第二章 经济计划的制订与执行 / 90

第一节 经济计划的编制 / 90

- 一、编制计划的方针方法 / 90
-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 96
- 三、年度计划的编制 / 100

第二节 经济计划的执行 / 106

- 一、统一部署和管理基本建设项目 / 107
- 二、加强各级党委对计划落实的监督检查 / 108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 109
- 四、积极推行企业经济责任制 / 112
- 五、加强思想教育 / 114

第三节 计划管理的初期特点 / 116

- 一、强调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合 / 116
- 二、以计划管理为主，同时重视市场调节 / 117
- 三、计划管理形式多样 / 118
- 四、注重按比例发展和坚持综合平衡 / 120

第三章 计划经济运行的初期效果 / 123

第一节 冲破低水平“贫困陷阱” / 123

- 一、“贫困的恶性循环”噩梦 / 123
- 二、抓住利用外援的历史机遇 / 126
- 三、突破“瓶颈”的制度安排 / 129

第二节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 131

- 一、政府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 / 131
- 二、所有制结构发生剧烈改变 / 134
- 三、产业结构不断改善 / 136
- 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138

第三节 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 / 139

- 一、“以苏联为榜样” / 140
- 二、“计划经济如何搞？” / 143
- 三、着手调整的具体行动 / 149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计划体制变革 / 152

第一节 毛泽东的双重“赶超”战略 / 152

- 一、批评“反冒进” / 153
- 二、超越苏联发展模式 / 156
- 三、“大跃进”战略的形成 / 161

第二节 “大跃进”时期经济体制变革 / 165

- 一、经济决策权力的大规模下放 / 165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 / 169
- 三、成立经济协作区 / 171
- 四、建立农村人民公社 / 173

第三节 主观随意的计划工作 / 175

- 一、计划工作的变化 / 175
-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 179
- 三、年度计划的编制和执行 / 184

第四节 “大跃进”时期经济体制变革后果 / 190

- 一、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 191
- 二、微观经济管理模式 / 193
- 三、国民经济的短期亢奋 / 195
- 四、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内伤 / 197

第五章 调整时期中央计划体制的修复 / 201

第一节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落实 / 201

- 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确立 / 202
- 二、调整方针的贯彻落实 / 203
- 三、对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 208

第二节 中央计划体制的修复 / 211

- 一、经济管理权的上收 / 212
- 二、调整人民公社体制 / 214
- 三、加强工业企业的整顿 / 220
- 四、调整后期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 223

第三节 经济调整年代的计划工作 / 225

- 一、计划工作在反思中得以加强 / 225
-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走样 / 231
- 三、改组国家计委与备战计划的形成 / 235

第四节 国民经济调整恢复的效果 / 244

- 一、经济总量和比例关系基本恢复 / 244
- 二、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指标仍有欠账 / 247
- 三、重工业发展战略转变机遇转瞬即逝 / 248

第六章 “文革”时期计划经济的混乱 / 252

第一节 “文革”发动对经济工作的严重冲击 / 252

- 一、“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经济根源 / 253**
- 二、“文革”爆发对计划经济的严重冲击 / 256**
- 三、“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 262**

第二节 “文革”时期经济体制变动 / 266

- 一、经济综合管理部门陷入半瘫痪 / 266**
- 二、1970年前后的权力下放 / 270**
- 三、“三个突破”标志计划管理失控 / 273**
- 四、“文革”后期的经济整顿 / 275**

第三节 经济计划的执行效果 / 278

- 一、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 / 278**
- 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 280**
- 三、“文革”十年中国经济的总体状况 / 282**

第七章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 / 295

第一节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 / 295

- 一、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经济的起飞 / 296**
- 二、实现了初级工业化 / 301**
- 三、开创农业发展新纪元 / 305**
- 四、其他领域的巨大成就 / 309**

第二节 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特点 / 312

- 一、现代化经济的奠基性 / 312**